

迈向橄榄型社会的心理意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公平感提升*

张 衍¹ 王俊秀² 许博洋³ 崔雨晴²

(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732)

(²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³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 100088)

摘 要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推进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为考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公平感的关系, 本文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2021 年 8 期数据($N = 61,751$)。结果发现: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公平感的关系受到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调节,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感知在其中起到相互拮抗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 当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低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降低公平感,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有显著负向的中介作用, 而向上流动感知有显著正向的中介作用; 当收入或经济发展水平变高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公平感的预测作用转为正向,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作用转为正向, 而向上流动感知的中介作用转为负向。时空异质性检验发现研究结果具有可推广性。总的来说, 本研究提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应以经济发展为先。

关键词 社会公平感; 社会比较; 隧道效应; 中等收入群体; 共同富裕

分类号 B849: C91

1 问题提出

合理的社会结构有助于社会稳定, 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是最优选择(苏海南, 2003)。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并设定到 2035 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目标。对此, 学界在收入分配、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 但现有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中等收入群体的心态特征, 如他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认知等(黄永亮, 2022; 杨灿, 2019; 邹宇春, 2023), 却鲜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宏观视角, 揭示这一政策对民众社会心理的影响机制。

社会公平感也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和“晴雨表”(李伟, 2019; 杨灿, 2019)。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收入分配结构的客观描述, 与民众的主观公平感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不同情境下, 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是否都能有效提升公平感? 其机制在不同群体间有何差异? 本文重点探讨宏观层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微观层面个体公平感的关系, 分析其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 并进行分时期和区域的描述性分析和异质性分析。

1.1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公平感

有研究发现不平等会损害社会公平感(Reyes & Gasparini, 2022), 但也有研究发现, 不平等不会直接降低社会公平感(Trump, 2020)。中国的研究发现: 尽管改革开放后收入不平等提高, 但民众倾向于认为当前的资源分配较为公平(怀默霆, 2009; Whyte, 2010)、公平感逐渐提升(李伟, 2019; 魏钦恭等, 2014)。

本文认为, 这些不一致或反直觉的结果, 部分源于传统不平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主要关注贫富差距的分布均衡性而忽视分配结构的合理性。虽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降低不平等密切相关, 但

收稿日期: 2025-07-21

*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024QQJH153);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24 年度研究所实验室综合资助项目“社会心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验室”(项目编号: 2024SYZH009)资助。

通信作者: 王俊秀, E-mail: casswjx@163.com

两者存在本质区别: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侧重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本身, 而降低不平等则更关注缩小收入差距。过大的贫富差距与绝对的平均都非理想的分配模式, 也不一定能提升公平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才可能是促进社会稳定与公平的有效路径。因此, 本文认为, 以优化分配结构为核心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将有助于提升公平感, 并提出总效应假设:

假设 1: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提高公平感。

1.2 中介机制: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向上流动感知

本文基于社会比较理论和隧道效应, 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公平感关系的中介机制。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与周围或相似的群体比较(Wood, 1996)。比较时, 个体可能出于自我完善的动机和“比上不比下”的方向偏好, 产生相对剥夺感; 也可能出于自我增强的动机寻求与地位较低的人进行比较, 产生相对优越感(张文宏 等, 2023)。因此,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能让更多民众进入高收入群体, 感受到相对过去的地位提升和相对周围人的优越感,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提高, 进而提升公平感。研究发现, 积极的社会比较可以提升公平感(高文珺, 2020)。

隧道效应(Hirschman & Rothschild, 1973)想象了一个同方向的双车道隧道, 两条车道都堵得水泄不通。“此刻, ‘我’在左侧车道上, 被堵得心烦意乱。过了一会儿, 右侧车道的车开始移动。‘我’的情绪很自然地高涨起来, 因为‘我’知道交通堵塞有所缓解。‘我’这条车道上的车马上也可以开始向前移动。”因而,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能让民众感到更多人车速增加了, 自己的车速也有一天会增加, 向上流动感知提高, 进而提升公平感。研究发现, 社会地位流动预期能显著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感(郑畅, 孙浩, 2016)。

因此,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感知的并行中介作用来提升民众的公平感, 包括以下两个子假设:

假设 2.1: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作用来提高公平感;

假设 2.2: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向上流动感知的中介作用来提高公平感。

1.3 边界条件: 收入与经济发展阶段

根据社会地位结构决定论(Ng & Allen, 2005),

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对不平等的看法受自利动机的影响: 优势群体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 认可现有分配状况; 而弱势群体则更可能认为现有分配不公(许琪 等, 2020)。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中, 高收入群体作为相对优势群体, 其公平感可能更高。这个过程有两种机制。第一,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 随着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将感受到更强烈的相对优越感, 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升公平感; 而低收入群体将感受到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导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公平感降低。第二, 隧道效应使低收入群体看到更多人进入中速车道, 感到向上流动的希望更大, 公平感提高; 而高收入群体则更可能产生向下流动的危机感和向上流动的局限感, 公平感降低。这两种机制相互拮抗, 决定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不同收入群体公平感的影响效力为正还是为负, 但总的来说, 根据社会地位结构决定论, 收入越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其公平感的提升作用可能越大。基于此, 本文提出针对收入边界条件的两个子假设:

假设 3.1: 收入越高的民众,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其公平感的提升作用越大;

假设 3.2: 对于较低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提高向上流动感知来提升公平感、通过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公平感; 对于较高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升公平感、通过降低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公平感。

经济发展水平也调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公平感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用“蛋糕”比喻, 强调既要做大“蛋糕”, 也要分好“蛋糕”。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蛋糕越大, 若分配更均匀, 民众的公平感将更高。因此,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公平感的提升作用更大。这个过程也存在两种相互拮抗的机制。第一,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低时, 低收入者占主体, 与新形成的中等收入群体比较下, 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比重更大, 平均效应上体现为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公平感; 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 高收入者占主体, 与新形成的中等收入群体比较下, 产生相对优越感的比重更大, 平均效应上更易表现为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公平感。第二, 根据隧道效应(Hirschman & Rothschild, 1973), 在经济发展初期也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低收入者占主体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易从平均效应上带来向上流动感知和公平感

的提高;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高收入占主体时,向下流动的恐惧的比重更大,在平均效应上更易表现为向上流动感知和公平感的下降。故本文提出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边界条件的两个子假设:

假设 4.1: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公平感的提升作用越大;

假设 4.2: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提高向上流动感知来提升公平感、通过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公平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升公平感,通过降低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公平感。

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有双重调节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蛋糕较小时,意味着资源有限、竞争压力较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能只对占据优势地位的高收入群体有利;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蛋糕较大时,意味着资源充足,竞争压力较小,各群体间更易互惠互利。因此,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或”(OR)的关系:只要满足其中一个条件(高经济发展水平或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能提高公平感。若两者都低,提升效果最弱;若两者都高,提升效果最强。这一过程也涉及两种相互拮抗的作用机制。第一,根据社会比较理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还能成为高收入群体的民众,将产生更强烈的优越感,通过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升其公平感;但此时还是低收入群体的民众,则可能产生更强烈的剥夺感,通过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其公平感。第二,根据隧道效应,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给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希望,通过提高向上流动感知来提升他们的公平感。然而,若经济发展伴随不平等增加(Kelley & Evans, 2017),低收入群体可能感到愤怒。此时,如果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来降低社会不平等,或将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更强烈的向上流动感知,从而提升其公平感。此外,在高经济发展水平下,社会群体边界更固定(Kelley & Evans, 2017),结构的调整可能给高收入群体带来更强烈的向下流动恐惧,降低向上流动感知和公平感。因此,本文提出针对双重调节效应的两个子假设:

假设 5.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高收入群体公平感提升作用更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不同收入群体公平感的提升作用都更大;

假设 5.2: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能通过提高较高收入群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升其公平感,但也更能通过降低其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其公平感;更能通过提高较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感知来提升其公平感,但也更能通过降低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其公平感。

1.4 理论和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基于社会比较理论和隧道效应,构建了理论框架,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向上流动感知的机制,以及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边界条件(图 1)。考虑到我国发展速度较快、区域差距较大,本文还将进行分时期和区域的描述性分析和异质性分析,用于检验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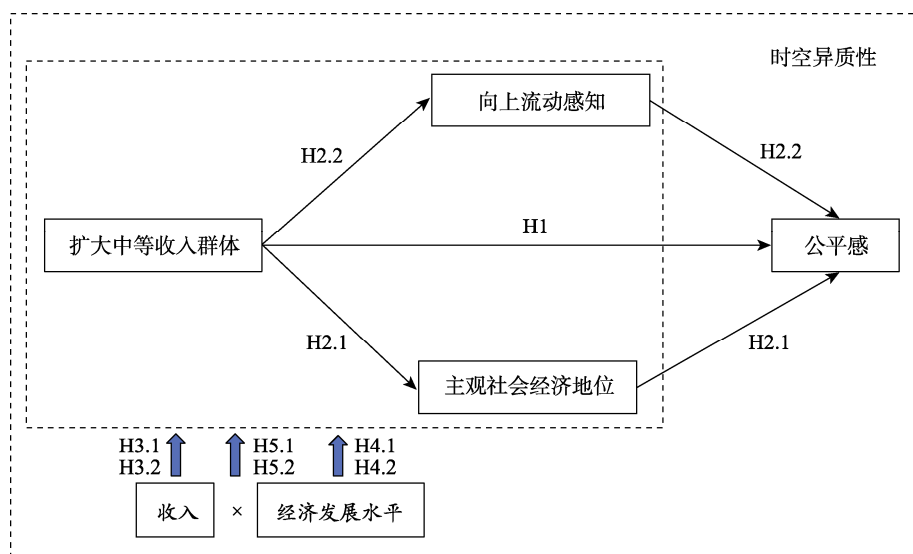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图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样本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它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入户随机抽样调查。为获得足够多的省级层面数据, 本文将 CGSS 2010、2011、2012、2013、2015、2017、2018、2021 年八次调查数据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考虑到被试认知能力对回答结果的影响, 本文选择 18~70 岁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由于需要根据收入计算中等收入群体占比, 本文遂剔除了无家庭收

入、家庭收入为“不清楚”或无明确家庭收入的被试数据, 之后还在统计分析时剔除了主要研究变量有缺失的被试, 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的数据包括来自全国除港澳台外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研究样本 61 751 份, 其中男性 29 904 人(48.43%), 女性 31 847 人(51.57%); 农村 23 548 人(38.13%), 城镇 38 203 人(61.87%)。全样本和分时期样本特征详见表 1。

2.2 研究变量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为使不同时期和区域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具有统

表 1 样本特征

变量	全样本特征			分时期均值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5	2017	2018	2021
个体变量											
公平感	3.09	1.05	1~5	2.96	3.08	3.02	2.97	3.18	3.06	3.17	3.42
性别	0.48	0.50	0=女性、1=男性	0.48	0.47	0.52	0.51	0.48	0.47	0.47	0.46
年龄	46.20	13.72	18~70	44.89	45.29	45.82	45.35	46.46	46.97	47.60	47.27
居住地	0.62	0.49	0=农村、1=城镇	0.60	0.57	0.60	0.61	0.59	0.64	0.71	0.58
家庭年收入(对数)	10.54	1.12	4.61~16.12	10.12	10.15	10.37	10.55	10.60	10.74	10.80	11.01
受教育年限	9.31	4.46	0~19	8.96	8.87	9.20	9.31	9.19	9.62	9.35	10.10
民族状况	0.92	0.27	0=少数民族、1=汉族	0.90	0.95	0.91	0.92	0.92	0.92	0.93	0.93
宗教信仰	0.11	0.31	0=无、1=有	0.13	0.11	0.14	0.10	0.10	0.10	0.10	0.07
政治面貌	0.11	0.31	0=非共产党员、1=共产党员	0.12	0.10	0.12	0.10	0.10	0.10	0.10	0.12
健康状况自评	3.61	1.09	1~5	3.67	2.87	3.62	3.80	3.71	3.57	3.64	3.58
工作状态-无工作	0.33	0.47	0=否、1=是	0.31	0.28	0.29	0.30	0.35	0.36	0.38	0.40
工作状态-务农	0.23	0.42	0=否、1=是	0.27	0.29	0.26	0.24	0.22	0.19	0.18	0.16
工作状态-非农工作	0.44	0.50	0=否、1=是	0.42	0.43	0.45	0.46	0.43	0.45	0.44	0.43
婚姻状况	0.82	0.39	0=未婚、1=已婚	0.85	0.84	0.84	0.83	0.81	0.80	0.80	0.76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4.21	1.69	1~10	4.04	4.12	4.17	4.36	4.32	4.14	4.26	4.31
向上流动感知	1.00	1.39	-9~9	1.16	1.21	1.12	1.06	0.95	0.88	0.78	0.91
省级变量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	0.48	0.08	0.28~0.81	0.46	0.49	0.49	0.52	0.48	0.46	0.45	0.47
人均 GDP(对数)	10.70	0.50	9.46~12.14	10.24	10.44	10.53	10.63	10.76	10.92	11.02	11.26
人均 GDP 增速	0.12	0.06	-0.02~0.29	0.18	0.19	0.10	0.10	0.05	0.10	0.10	0.14
城镇化率	0.58	0.13	0.23~0.90	0.51	0.54	0.54	0.56	0.59	0.62	0.63	0.65
性别比(女性=100)	104.79	3.78	95.77~120.43	104.29	104.99	104.85	105.23	105.56	104.44	104.72	104.11
总抚养比	36.75	7.38	19.3~56.7	34.92	33.73	34.33	34.51	36.02	38.14	38.97	46.65
社会保障占比	0.13	0.03	0.06~0.28	0.12	0.12	0.11	0.12	0.13	0.14	0.14	0.16
第三产业占比	0.47	0.09	0.32~0.83	0.43	0.43	0.44	0.45	0.49	0.52	0.53	0.51
私营就业人员占比	0.33	0.12	0.08~0.73	0.29	0.30	0.30	0.29	0.33	0.37	0.38	0.41
高等教育招生比	1.08	0.57	0.38~3.54	0.93	1.02	0.99	1.01	1.06	1.14	1.17	1.42
样本数	61751	/	/	9189	4289	9053	8653	7954	9028	8886	4699
省份数	217	/	/	31	26	29	28	28	28	28	19

注: 工作状态为三分类变量, 进行了虚拟变量转换; 其余 0、1 编码的为二分类变量。分类变量各类别的百分比可通过均值得知, 如性别中, 男性编码为 1, 则男性的百分比为性别的均值 48%, 由此也可知女性的百分比为 52%。

一标准下的可比性,本文采用相对标准进行分析。并且,李春玲(2022)认为,以绝对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反映的是经济增长趋势,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以相对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反映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适用于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一方面,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另一方面,缩小收入差距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因此,使用相对标准更合适。参考 OECD (2019)的定义,将在 CGSS 历年各省数据中,位于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 0.75 倍~2 倍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低于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 0.75 倍界定为低收入群体,高于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 2 倍界定为高收入群体,并根据各群体占样本量的比例生成历年各省的低、中等和高收入群体占比。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社会公平感,在 CGSS 中该变量采用一道题“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进行测量,被试从完全不公平(=1)到完全公平(=5)间进行选择,“不知道”或“拒绝回答”被视为缺失值,分数越高代表公平感越高。在其他全国大型抽样调查中(如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居民社会心态调查等),都使用了这个题目测量公平感。虽然,一道题目是否可以有效反映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是有所争议的;但是,在方法层面,尚未见对公平感单题测量有效性的研究,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方法的研究认为,单一题目能比多个题目提供更稳健的结果(Diemer et al., 2013; Hoff & Laursen, 2019)。

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感知。其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采用当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进行测量,在 CGSS 中采用一道题“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进行测量,使用 10 层阶梯法,被试从最低等级(=1)到最高等级(=10)进行选择,分数越高代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在 CGSS 中,十年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同样采用 10 层阶梯法,通过一道题“您认为您 10 年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进行测量。向上流动感知采用十年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减去当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生成,分数越正代表为感知的流动方向越向上,分数越负代表感知的流动方向越向下。

调节变量。本文包括了两个调节变量,分别是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收入采用家庭年收入来表示,取对数使用。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历年 CGSS 调查所对应的上一年的各省人均 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取对数使用,人均

GDP 的对数越高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变量和宏观变量。个体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居住地、受教育年限、是否为少数民族、是否为中共党员、健康状况自评、工作状况和婚姻状况。宏观变量为省级变量,包括可能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和公平感都有关联的变量。首先,参考朱斌(2024)的方式,纳入公共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支出,代表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转移支付水平,如果转移支付水平高,低收入群体将会从中更受益,也更可能因此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还纳入了代表后工业化水平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代表市场化水平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占城镇单位(包括私营和非私营)就业人员的比重,代表城镇化水平的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后工业化水平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意味着该省能够提供更多的中等收入工作岗位机会;并且还包括代表性别结构的性别比,以及代表年龄结构的总抚养比,它们都可能影响一个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难度(孙伯驰, 2024)。此外,考虑到人均 GDP 增长率和高等教育招生比(相比同年毕业生人数)也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和公平感的宏观因素(张衍, 2024),本文也将这两者纳入为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上一年《中国统计年鉴》。对连续变量均进行中心化处理,对分类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¹。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R 4.4.2 作为分析软件,因研究模型涉及微观和宏观变量,运行仅包含因变量的零模型以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通过计算可得 ICC (1)为 0.029,小于临界值 0.059,但是考虑到理论上来说个体变量和省域变量并不在一个层面,因此仍然决定使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个体变量作为层一变量,省域变量作为层二变量。因本文主要关注固定效应模型,故仅设定随机截距,而不考虑随机斜率。模型可用公式表示为:

$$\text{层一(个体层): } Y_{ij} = \beta_{0j} + \beta_{1j}X_{1ij} + \cdots + \beta_{pj}X_{pij} + e_{ij}$$

$$\text{层二(省级层): }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W_{1j} + \cdots + \gamma_{0q}W_{qj} + \mu_{0j}$$

$$e_{ij} \sim N(0, \sigma^2), \mu_{0j} \sim N(0, \sigma_{\mu_0}^2)$$

¹ 年龄为年龄中心化后除以 10, 年龄平方为年龄中心化除以 10 后的平方。

其中, y_{ij} 指个体 ij 的因变量得分, 在本文中即单个个体的公平感得分; β_{0j} 指在第 j 个省份中的公平感均值, 是随机截距; β_{1j} 是个体层面第 1 个变量 X_1 的固定效应参数; β_{pj} 是个体层面第 p 个变量 X_p 的固定效应参数; e_{ij} 是个体层面的随机误差, 表示个体 ij 与第 j 个省份中公平感均值的差异, 假定服从均值为 0, 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 γ_{00} 指总公平感的均值; γ_{01} 是省级层面第 1 个解释变量 W_1 的固定效应参数; γ_{0q} 是省级层面第 q 个解释变量 W_q 的固定效应参数; μ_{0j} 为第 j 个省份的随机效应, 假定服从均值为 0, 方差为 $\sigma_{\mu_0}^2$ 的正态分布。

2.4 共同方法偏差

本文中, 社会公平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感知均为主观变量,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 对这三个变量进行 Harman 单因素检验。将它们纳入探索性因子分析, 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08%, 远小于临界值 40%, 表明本文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分析: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和公平感的时空变化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 48% 左右(图 2), 与同样标准下使用 CGSS 数据的其他研究结果类似(李金昌 等, 2023; 陈宗胜, 陈涛峰, 2024)。2010~2021 年间, 平均每年省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后发现,

年均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虽有所波动, 但整体较为稳定, 扩大相对标准下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有一定的难度。我国民众公平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为 3.09 ± 1.05 。公平感的时期变化呈现出波动性上升的趋势, 并于 2021 年达到最高值 3.42 ± 0.96 。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公平感的变化趋势上来看, 2010~2012 年, 以及 2015~2021 年间, 两者几乎是同步变化; 而在 2012~2015 年间, 两者变化趋势相反, 主要表现在 2013 年时中等收入占比最高, 而公平感反而较低。

分东、中、西部地区的研究也发现(图 3),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集中在 40%~55% 之间, 且基本都在 48% 上下波动, 未呈现明显的整体上升或下降趋势; 2011~2018 年间, 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高于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高于西部地区。公平感则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 且中西部地区公平感高于东部地区, 但区域差异有所缩小。

可见,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公平感的变化趋势并非完全一致,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较为稳定, 而公平感有所上升; 二是东部地区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高于中西部, 而中西部的公平感却高于东部。但是, 这样的描述性分析尚不能准确揭示两者关系。为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下文将基于全样本数据, 运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建立省域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个体公平感的量化关系模型, 并分析其时空异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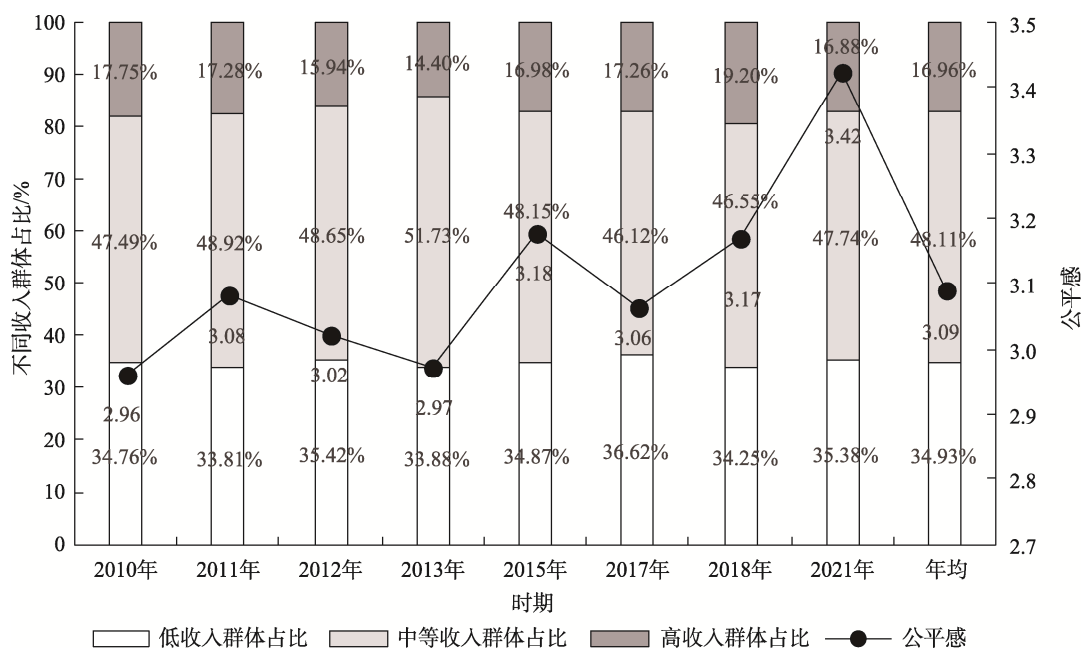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收入群体占比与公平感的时期变化(2010~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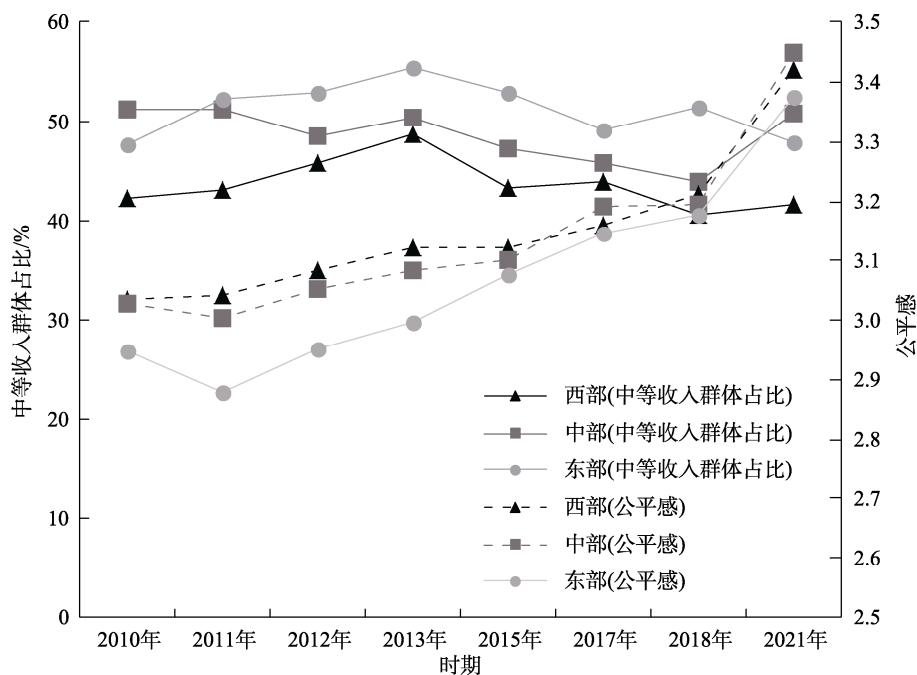


图 3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公平感的区域变化(2010~2021 年)

表 2 总效应与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因变量-公平感	模型 2: 因变量-公平感	模型 3 因变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模型 4: 因变量-向上流动感知
截距	0.369*** (0.063)	0.263*** (0.063)	0.504*** (0.081)	2.361*** (0.06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	0.435*** (0.077)	0.403*** (0.076)	0.316** (0.115)	-0.102 (0.095)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103*** (0.003)		
向上流动感知		0.023*** (0.003)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3.2 总效应与并行中介效应

3.2.1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公平感的关系

如表 2 (模型 1)所示,控制了个体变量和省级变量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越高的省份,其民众的公平感越高($B = 0.435$, $SE = 0.077$, $95\% CI = [0.284, 0.585]$, $p < 0.001$)²。省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每增加 10%, 该省民众的公平感可增加 0.044 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显著提高民众公平感, 假设 1 得到验证。

3.2.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向上流动感知的并行中介效应

根据 Hayes (2013)的 Process 包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10 万次, model 4), 如表 2 (模型 2~4)和图 4 所示, 在 95%置信区间

下,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感知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公平感(中等收入群体占比: $B = 0.403$, $SE = 0.076$, $95\% CI = [0.255, 0.551]$, $p < 0.00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B = 0.103$, $SE = 0.003$, $95\% CI = [0.098, 0.109]$, $p < 0.001$; 向上流动感知: $B = 0.023$, $SE = 0.003$, $95\% CI = [0.017, 0.029]$, $p < 0.001$), 而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仅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B = 0.316$, $SE = 0.115$, $95\% CI = [0.090, 0.542]$, $p = 0.006$), 却不能显著预测向上流动感知($B = -0.102$, $SE = 0.095$, $95\% CI = [-0.289, 0.085]$, $p = 0.287$)。

在中介效应上,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效应正向显著($B = 0.033$, $SE = 0.011$, $95\% CI = [0.013, 0.056]$, $p < 0.001$),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7.58%; 而向上流动感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B = -0.002$, $SE =$

² 因部分回归值较小, 对所有回归分析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 3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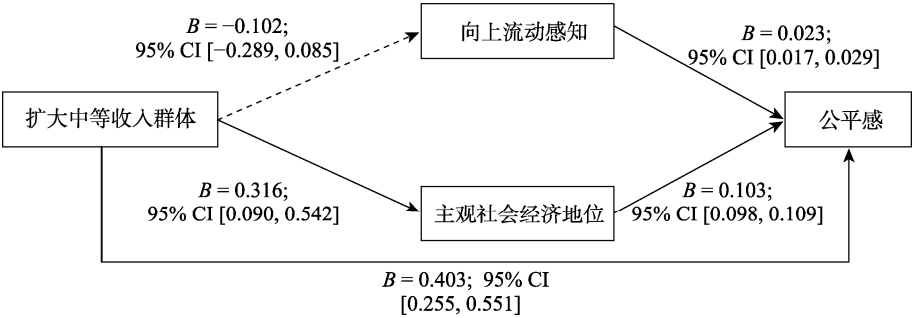


图 4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向上流动感知的并行中介效应

0.002, 95% CI = [-0.006, 0.002], $p = 0.226$)。也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向上流动感知,来提高民众的公平感,假设 2.1 得到验证,假设 2.2 未得到验证。

3.3 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3.3.1 总效应的调节效应

将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收入建立交互项,结果发现(表 3, 模型 1),在 95%置信区间上,收入可以显著调节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公平感间的关系($B = 0.352$, $SE = 0.058$, 95% CI = [0.239, 0.465], $p < 0.001$)。具体来看(图 5a),随着收入的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的效应从显著负向变为显著正向,并不断增大。假设 3.1 得到验证。

将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人均 GDP 建立交互项,结果与收入类似(表 3, 模型 2),在 95%置信区间上,

人均 GDP 可以显著调节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公平感间的关系($B = 0.814$, $SE = 0.157$, 95% CI = [0.506, 1.121], $p < 0.001$)。具体来看(图 5b),随着省人均 GDP 的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的效应从显著负向变为显著正向,并不断增强。假设 4.1 得到验证。

3.3.2 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

首先分析收入在并行中介效应中的调节作用(重复抽样 10 万次, model 7),结果显示(表 3, 模型 3),在 95%置信区间下,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收入的交互项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B = 0.951$, $SE = 0.088$, 95% CI = [0.779, 1.123], $p < 0.001$),但是会显著负向预测向上流动感知($B = -0.306$, $SE = 0.073$, 95% CI = [-0.448, -0.164], $p < 0.001$)。

表 3 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路径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收入→公平感	0.352*** (0.058)				0.215*** (0.063)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人均 GDP→公平感		0.814*** (0.157)			0.658*** (0.169)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收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951*** (0.088)			0.863*** (0.096)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收入→向上流动感知			-0.306*** (0.073)			-0.226** (0.079)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人均 GDP→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1.877*** (0.235)		1.134*** (0.253)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人均 GDP→向上流动感知				-0.567** (0.195)		-0.207 (0.210)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收入×人均 GDP→公平感					-0.236* (0.117)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收入×人均 GDP→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086 (0.178)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收入×人均 GDP→向上流动感知						-0.553*** (0.147)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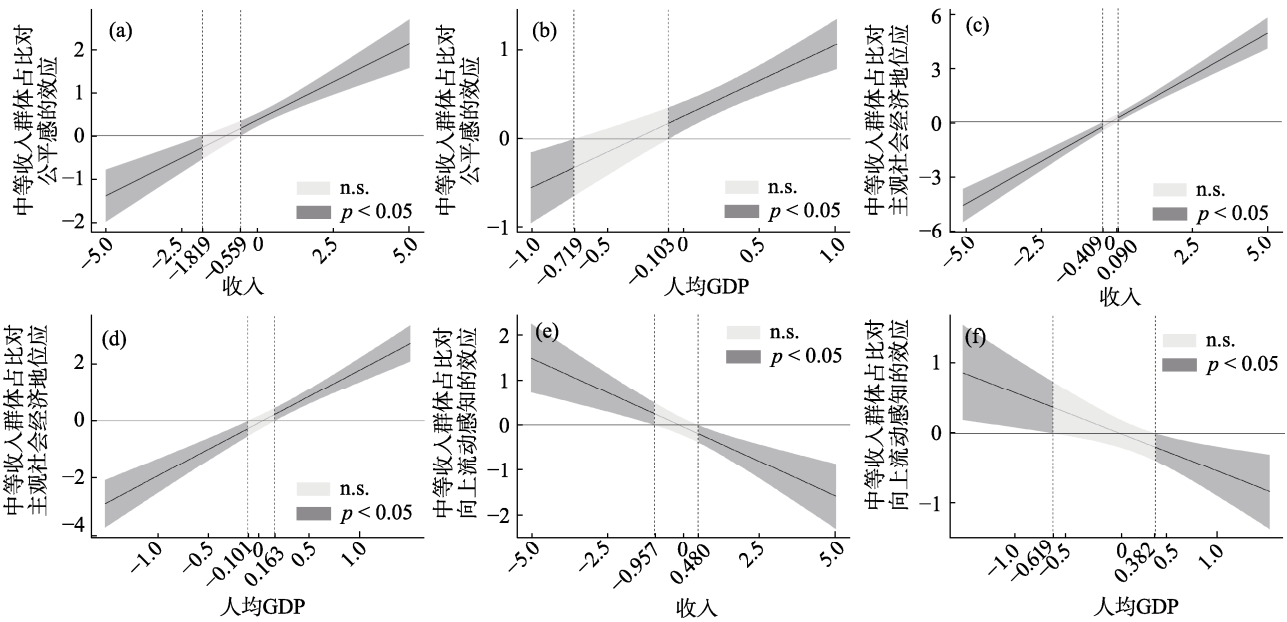


图 5 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调节作用的 Johnson-Neyman 图

注:图 a 和 b 表示随着收入或人均 GDP 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的效应从显著负向变为显著正向;图 c 和 d 表示随着收入或人均 GDP 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效应从显著负向变为显著正向;图 e 和 f 表示随着收入或人均 GDP 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向上流动感知的效应从显著正向变为显著负向。

具体来说,随着收入升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效应从显著负向变为显著正向(图 5c),而对向上流动感知的效应则从显著正向变为显著负向(图 5e)。这在中介效应上表现为(表 4),对于较高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提高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高公平感,而通过降低其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公平感;而对于较低收入群

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提高其向上流动感知来提高公平感,而通过降低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公平感,假设 3.2 得到验证。

继续分析人均 GDP 在并行中介效应中的调节作用(重复抽样 10 万次, model 7),结果也与收入类似(表 3, 模型 4),在 95%置信区间下,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人均 GDP 的交互项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

表 4 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对并行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结果

人均 GDP	收入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公平感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向上流动感知→公平感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1 SD	-0.095	0.018	0.000	[-0.124, -0.054]	0.007	0.003	0.025	[0.001, 0.012]
	M	0.013	0.012	0.265	[-0.007, 0.039]	-0.001	0.002	0.754	[-0.006, 0.004]
	+1 SD	0.126	0.016	0.000	[0.096, 0.154]	-0.009	0.003	0.003	[-0.014, -0.003]
	-1 SD	-0.097	0.021	0.000	[-0.137, -0.056]	0.006	0.003	0.072	[0.000, 0.013]
	M	0.005	0.011	0.667	[-0.017, 0.027]	-0.001	0.002	0.804	[-0.005, 0.003]
	+1 SD	0.111	0.013	0.000	[0.086, 0.136]	-0.008	0.003	0.023	[-0.015, -0.001]
	-1 SD	-0.169	0.026	0.000	[-0.225, -0.119]	0.005	0.004	0.217	[-0.003, 0.012]
	M	-0.059	0.022	0.006	[-0.100, -0.020]	0.006	0.004	0.163	[-0.002, 0.014]
	+1 SD	0.049	0.026	0.058	[0.001, 0.097]	0.006	0.005	0.254	[-0.004, 0.014]
	-1 SD	-0.098	0.018	0.000	[-0.136, -0.072]	0.010	0.004	0.004	[0.004, 0.017]
	M	0.003	0.012	0.811	[-0.017, 0.023]	0.003	0.002	0.256	[-0.002, 0.008]
	+1 SD	0.100	0.017	0.000	[0.073, 0.137]	-0.004	0.003	0.171	[-0.010, 0.001]
	-1 SD	-0.030	0.027	0.277	[-0.086, 0.017]	0.015	0.006	0.011	[0.005, 0.025]
	M	0.067	0.017	0.000	[0.036, 0.097]	0.001	0.003	0.831	[-0.005, 0.007]
	+1 SD	0.158	0.017	0.000	[0.129, 0.197]	-0.014	0.004	0.000	[-0.021, -0.007]

观社会经济地位($B = 1.877$, $SE = 0.235$, 95% $CI = [1.416, 2.338]$, $p < 0.001$), 但是会显著负向预测向上流动感知($B = -0.567$, $SE = 0.195$, 95% $CI = [-0.949, -0.184]$, $p = 0.004$)。

具体来说, 随着人均 GDP 升高,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效应从显著负向变为显著正向(图 5d), 而对向上流动感知的效应则从显著正向变为显著负向(图 5f)。这表现在中介效应上即(表 4), 当人均 GDP 较高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高公平感, 而通过降低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公平感; 当人均 GDP 较低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向上流动感知来提高公平感, 而通过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公平感, 假设 4.2 得到验证。

3.4 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调节效应

3.4.1 总效应的双重调节效应

首先, 将人均 GDP 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和收入建立三重交互项, 结果发现(表 3, 模型 5), 三重交互项显著为负($B = -0.236$, $SE = 0.117$, 95% $CI = [-0.466, -0.007]$, $p = 0.043$), 也即人均 GDP 和收入对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与公平感间的关系起到双重调节作用。采用多项式曲面拟合技术(周由 等, 2023)制作三维可视化的双重调节效应图发现(图 6a), 人均 GDP 越低且收入越低,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的效应越负; 但是人均 GDP 越高或收入越高,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的效应越正。换句话说, 人均 GDP 或收入只需要一个较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公平感就有显著提升作用; 但若两者都较低, 则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反而会显著降低公

平感。因此,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会提高较高收入群体的公平感, 但会降低较低收入群体的公平感;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提高所有收入群体的公平感。假设 5.1 得到验证。

3.4.2 中介效应的双重调节效应

将人均 GDP 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和收入建立三重交互项(重复抽样 10 万次, model 11), 结果显示(表 3, 模型 6), 在 95% 置信区间下,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收入和人均 GDP 的三重交互项不能显著预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B = -0.086$, $SE = 0.178$, 95% $CI = [-0.436, 0.264]$, $p = 0.631$), 但是显著负向预测向上流动感知($B = -0.553$, $SE = 0.147$, 95% $CI = [-0.842, -0.264]$, $p < 0.001$)。根据双重调节效应图发现(图 6b), 人均 GDP 较高且收入较低, 或人均 GDP 较低且收入较高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显著提升向上流动感知; 而当人均 GDP 较高且收入较高、或人均 GDP 较低且收入较低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反而会显著降低向上流动感知。

并行中介机制的双重调节结果显示(表 4), 当人均 GDP 较低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显著降低较低收入群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其公平感, 而通过显著提高较高收入群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升其公平感; 当人均 GDP 较高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显著提高较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感知来提升其公平感, 而通过显著降低较高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其公平感, 但同时通过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高较高收入群体公平感这一效应显著更大了, 相比人均 GDP 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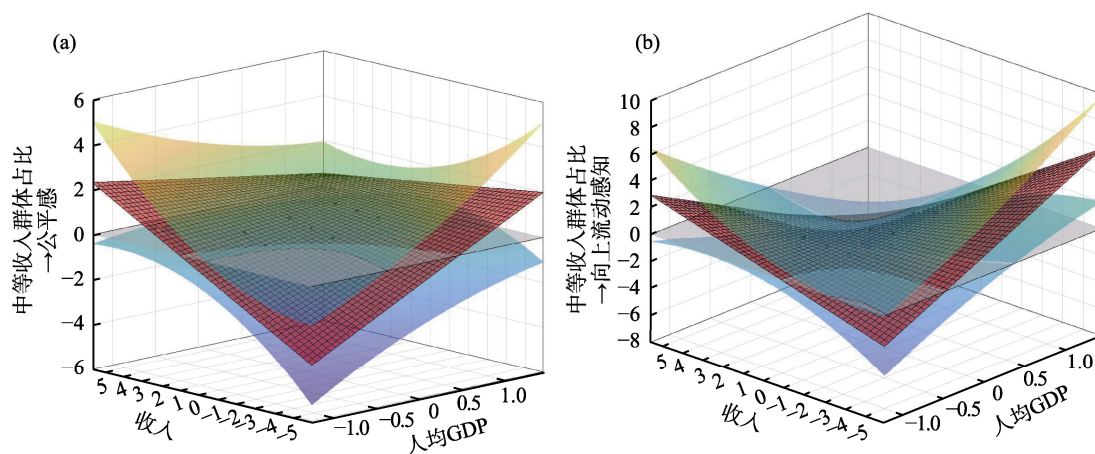


图 6 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双重调节效应的拟合曲面图

注: 红色网格面代表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的效应, 上方橙色面代表 95% 置信区间的上限, 下方蓝色面代表 95% 置信区间的下限, 灰色面代表效应值为 0 的空间位置。彩图见电子版。

时,置信区间不重合。

总的来说,人均GDP越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越能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高较高收入群体的公平感,但也通过降低其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公平感;越能通过向上流动感知来提高较低收入群体的公平感,但并不会通过降低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公平感。反而是在人均GDP较低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会通过降低较低收入群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公平感。假设5.2仅得到部分验证。

3.5 时空异质性检验

为探讨本文理论框架和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本文进一步对全部结果进行了时空异质性分析。先将时期作为虚拟变量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建立交互项,计算得到各时期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

的效应值,如网络版附图1所示,2010~2012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均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而2013~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公平感。根据此结果,将时期以2012年为分界线,分为2010~2012年、2013~2021年两个时间段进行异质性分析。此外,在空间上,按东、中、西部划分标准,进行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总效应、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到,本文的总效应主要适用于2013~2021年时间段及东部地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感知的并行中介效应也仅在2013~2021年时间段与全样本的结果一致;在东部地区,虽结果与全样本不完全一致,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会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降低向上流动感知,与

表5 时空异质性检验结果与全样本结果的对比

效应	路径	全样本	2010~2012年	2013~2021年	西部	中部	东部
总效应	中等收入群体 →公平感	0.435*** (0.077)	0.016 (0.179)	0.347*** (0.099)	-0.089 (0.204)	-0.271 (0.172)	0.820*** (0.107)
	中等收入群体 →公平感	0.403*** (0.076)	-0.017 (0.177)	0.281** (0.098)	-0.071 (0.203)	-0.203 (0.170)	0.728*** (0.106)
中介效应	中等收入群体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316** (0.115)	0.179 (0.254)	0.665*** (0.152)	-0.007 (0.298)	-0.753** (0.261)	0.929*** (0.171)
	中等收入群体 →向上流动感知	-0.102 (0.095)	-0.030 (0.206)	-0.167 (0.124)	-0.008 (0.261)	0.467* (0.212)	-0.547*** (0.137)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公平感	0.103*** (0.003)	0.100*** (0.004)	0.106*** (0.003)	0.080*** (0.005)	0.103*** (0.005)	0.119*** (0.004)
	向上流动感知 →公平感	0.023*** (0.003)	0.036*** (0.005)	0.014*** (0.004)	0.018** (0.006)	0.020** (0.006)	0.025*** (0.005)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 →公平感	0.352*** (0.058)	0.432*** (0.109)	0.312*** (0.070)	0.206 (0.128)	0.095 (0.127)	0.044 (0.107)
	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 →公平感	0.814*** (0.157)	1.545*** (0.445)	0.743*** (0.224)	1.620*** (0.560)	2.045*** (0.527)	-0.708* (0.302)
总效应的调节效应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人均GDP →公平感	-0.236* (0.117)	-0.354 (0.241)	0.051 (0.168)	-0.358 (0.382)	-0.158 (0.432)	0.235 (0.269)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951*** (0.088)	0.783*** (0.162)	0.770*** (0.108)	0.398* (0.195)	0.644*** (0.194)	0.880*** (0.165)
	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1.877*** (0.235)	0.851 (0.616)	0.937** (0.347)	2.966*** (0.806)	-1.065 (0.801)	0.704 (0.481)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 →向上流动感知	-0.306*** (0.073)	-0.127 (0.137)	-0.338*** (0.088)	-0.136 (0.166)	-0.598*** (0.158)	-0.266* (0.134)
	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 →向上流动感知	-0.567*** (0.195)	0.794 (0.485)	-0.731** (0.281)	1.451* (0.705)	-1.134† (0.081)	-1.698*** (0.386)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人均GDP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086 (0.178)	-0.087 (0.358)	0.428 (0.261)	0.646 (0.582)	0.042 (0.657)	-1.265** (0.418)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人均GDP →向上流动感知	-0.553*** (0.147)	-0.681* (0.303)	-0.164 (0.211)	-0.194 (0.497)	0.296 (0.535)	-0.548 (0.339)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951*** (0.088)	0.783*** (0.162)	0.770*** (0.108)	0.398* (0.195)	0.644*** (0.194)	0.880*** (0.165)
	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1.877*** (0.235)	0.851 (0.616)	0.937** (0.347)	2.966*** (0.806)	-1.065 (0.801)	0.704 (0.481)
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 →向上流动感知	-0.306*** (0.073)	-0.127 (0.137)	-0.338*** (0.088)	-0.136 (0.166)	-0.598*** (0.158)	-0.266* (0.134)
	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 →向上流动感知	-0.567*** (0.195)	0.794 (0.485)	-0.731** (0.281)	1.451* (0.705)	-1.134† (0.081)	-1.698*** (0.386)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人均GDP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086 (0.178)	-0.087 (0.358)	0.428 (0.261)	0.646 (0.582)	0.042 (0.657)	-1.265** (0.418)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人均GDP →向上流动感知	-0.553*** (0.147)	-0.681* (0.303)	-0.164 (0.211)	-0.194 (0.497)	0.296 (0.535)	-0.548 (0.339)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951*** (0.088)	0.783*** (0.162)	0.770*** (0.108)	0.398* (0.195)	0.644*** (0.194)	0.880*** (0.165)
	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1.877*** (0.235)	0.851 (0.616)	0.937** (0.347)	2.966*** (0.806)	-1.065 (0.801)	0.704 (0.48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阴影部分表示结果与全样本不同。

人均 GDP 高时的结果一致。而在中部地区，并行中介机制是相反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会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提高向上流动感知，与人均 GDP 低时的结果一致。可见，总效应和并行中介效应的结果是否稳健还取决于特定时空下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相对而言，2013~2021 年间，以及东部地区的发达程度更高，这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对于并行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附表 1 呈现了并行中介效应在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为上下一个标准差时的具体结果，而表 6 则将有显著作用的中介机制整理到一起。通过这两个表，可以看到两组相反的作用机制。首先，对于较高收入群体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都更能通过提高他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升公平感，尤其是在人均 GDP 较高，或社会整体较发达的时空(如 2013~2021 年和东部地区)；对于较低收入群体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中西部地区会通过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公平感。其次，对于较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主要是在中部地区会通过提高向上流动感知来提升公平感；而对于较高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则主要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期通过降低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公平感。总的来说，若将 2010~2012 年或西部地区看作经济欠发达地区，

2013~2021 年或东部地区看作经济较发达地区，而中部地区位于两者中间的话，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的时空异质性的结果与全样本基本一致，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和可推广性。

4 讨论

4.1 主要研究发现

本文利用 2010~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公平感的关系，提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向上流动感知的并行中介机制，以及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边界作用。时空异质性检验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和可推广性。具体来说，本文有以下主要发现：

4.1.1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提升公平感

本文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 48%，与同样标准下使用 CGSS 数据的其他研究结果类似(陈宗胜，陈涛峰，2024；李金昌 等，2023)。收入分配呈“橄榄型”结构时，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可达 60%(李金昌，任志远，2023)，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仍然不足。此外，本研究中，2010~2021 年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整体较为稳定，扩大相对标准下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面临一定难度。缩小收入差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李培林 等，2019)，随着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社会收入中位线是不断提高的，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扩大(李培林，2020)。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生活成本也制约了工薪族的财富积累，限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杨宜勇等，2016)。因此，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足和难以提高的问题，有必要在现阶段进行重点突破，才能实现到 2035 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刘世锦等，2022)。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各省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进行年平均后的结果，而在省级层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公平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收入国家，我国也更重视收入结构的合理性，出台了一系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韩康，2022)。未来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仅可能变得更合理，民众的公平感也可能更高。

4.1.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的并行中介作用

本文探讨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向上流动感知之间的并行中介效应，揭示了两者的不同作用。首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仅能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提升公平感，而未显著预测向上流动感知。这

表 6 并行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结果总结

样本	人均 GDP	较低收入群体 (-1 SD)		较高收入群体 (+1 SD)	
		主观社 会经济 地位	向上 流动 感知	主观社 会经济 地位	向上 流动 感知
全样本	较低(-1 SD)	↓		↑	
	较高(+1 SD)		↑	↑	↓
2010~2012 年	较低(-1 SD)			↑	
	较高(+1 SD)			↑	
2013~2021 年	较低(-1 SD)			↑	
	较高(+1 SD)			↑	↓
西部	较低(-1 SD)	↓		↓	
	较高(+1 SD)			↑	
中部	较低(-1 SD)		↑		
	较高(+1 SD)	↓	↑		
东部	较低(-1 SD)			↑	
	较高(+1 SD)			↑	↓

注：↑表示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通过显著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感知来提升公平感；↓表示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通过显著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公平感。

表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高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公平感。许多研究对民众收入水平提升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的现象感到困惑,社会比较理论被视为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高文珺,2018)。本文认为,社会比较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偏低,也给出了提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方案,即从客观上去调整收入结构。当我国形成“橄榄型”社会后,民众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公平感都可能更高。

此外,关于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社会比较和隧道效应两种机制存在拮抗作用,也即其中一个机制可以缓冲另一个机制的负面作用。例如,对较低收入群体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可利用向上流动感知的正向中介作用,来缓冲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负向中介作用;对较高收入群体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可利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正向中介作用,来缓冲向上流动感知的负向中介作用。

4.1.3 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调节作用

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对于较高收入群体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的民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易产生相对优越感,提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公平感。然而,双重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较高收入群体也有一个负面作用,即会通过降低向上流动感知来降低他们的公平感。这说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较高收入群体有维护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倾向。库涅兹曲线(Kuznets, 1955)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不平等会自然下降。然而,托马斯·皮凯蒂(2014)用多国数据发现,经济增长会伴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较高收入群体更希望维护自身社会经济地位(Ng & Allen, 2005)。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中,还应关注较高收入群体的向下流动焦虑。

对于较低收入群体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的民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易导致相对剥夺感,通过降低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公平感。这一点值得注意,说明当收入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此时,应以发展经济、提高收入为优先。双重调节效应分析结果也发现,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提高所有群体的公平感;而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仅能提高较高收入群体的公平感,反而会降低较低收入群体的公平感。并

且,不同于假设 5.2,实证结果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才会通过降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降低较低收入群体的公平感,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过程为显著正向。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就具有提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张衍,王俊秀,2023)。相比于假设来说,这一结果其实更积极,说明发展经济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对不同收入群体来说都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可以通过提高较低收入群体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民众的向上流动感知来提高公平感,这呼应了隧道效应。并且双重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还发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较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感知和公平感的提升作用更大。这说明对于较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感知可以缓冲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平感的负面作用。对于他们来说,打通向上流动渠道对提升公平感具有更积极的效果。

4.2 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试图通过实证研究,解读迈向橄榄型社会的心理意义,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层面解剖共同富裕政策内涵和意义的窗口。第二,本文将社会比较理论与隧道效应融合在一起,同时分析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感知的中介作用,并发现了两者的拮抗作用,是一次创新性的结合。第三,本文还对两个理论都有所扩展。对于社会比较理论,本研究发现,相对比较不仅会带来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也会带来高收入群体的相对优越感。对于隧道效应,本文检验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差异,强化了隧道效应理论的动态性。

4.3 实践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推进共同富裕应注意阶段性。当蛋糕还小时,分配平均不仅不会让人感到公平,反而可能挫伤积极性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当蛋糕较大时,就应该从以做大蛋糕为重点,转变为以分好蛋糕为重点。十六大以前,我国分配政策中基本上都是效率优先,近年来的发展战略则由注重效率转为注重公平(张衍,2024)。2010年,我国人均 GDP 突破了 4000 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刘娜,2013),在当前阶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构建“橄榄型”社会,具有更重大的社会和心理意义。

对当下社会治理和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启示:

首先, 要想更大地发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积极作用,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是前提, 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时,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发展高精尖产品、解决“卡脖子”等问题成为关键。其次, 我国收入分配的战略重心必须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让促进“共同”成为更核心的目标, 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分配结构、减少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再者, 对于不同区域“共同”和“富裕”的发展仍应有先后: 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 还应以发展经济为先; 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 则应以分配公平为先。最后, 在推进共同富裕政策时, 应以较低收入群体为重, 着力提高他们的向上流动感知、打通向上流动渠道、降低相对贫困, 利用未来期望缓冲相对剥夺感; 同时, 对于较高收入群体, 也可通过政策宣传和激励, 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不搞“劫富济贫”, 鼓励较高收入群体形成互利共赢的正能量和信念, 认识到“扩中”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 以缓解向下流动焦虑。

4.4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限于时间和数据, 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 本文主要是利用分省数据来模拟时期变化, 但是CGSS的省级代表性不足, 未来有更高省级代表性数据, 甚至市级、县级代表性数据时, 可进一步分析验证。第二, 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 无法探索因果关系, 未来可开展更多实验或干预研究。

5 结论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2021年8期数据, 本文发现,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公平感的关系受到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调节,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感知在其中起到相互拮抗的中介作用: 当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低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会降低公平感,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有显著负向的中介作用, 而向上流动感知有显著正向的中介作用; 当收入或经济发展水平变高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公平感的预测作用变为显著正向,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作用变为显著正向, 而向上流动感知的中介作用变为显著负向。时空异质性检验发现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可推广性。可见,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应以经济发展为先,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迈向橄榄型社会更有助于提升公平感。也即, 建立在“富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将更有利于提升民众的公平感。

参 考 文 献

- Chen, Z. S. & Chen, T. F. (2024). The measurement and trend analysis of the scale of China's middle-income group. *Changbai Journal*, (4), 1-24.
- [陈宗胜, 陈涛峰. (2024).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度与变动趋势分析. *长白学刊*, (4), 1-24.]
- Diemer, M. A., Mistry, R. S., Wadsworth, M. E., López, I., & Reimers, F. (2013). Best practices in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clas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13(1), 77-113.
- Gao, W. J. (2018). The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based on soci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4), 90-100.
- [高文珺. (2018). 基于社会比较的主观社会阶层过程模型.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 90-100.]
- Gao, W. J. (2020).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6(5), 28-44.
- [高文珺. (2020). 社会公平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6(5), 28-44.]
- Han, K. (2022). China's model of common prosperity. *Administration Reform*, (4), 4-8.
- [韩康. (2022). 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 *行政管理改革*, (4), 4-8.]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Guilford Press.
- Hirschman, A. O., & Rothschild, M. (1973).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4), 544-566.
- Hoff, E., & Laursen, B. (2019).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ing.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pp. 421-447). Routledge.
- Huai, M. T. (2009). Views of Chinese citizens on current inequalities. *Sociological Research*, (1), 96-120.
- [怀默霆. (2009).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 (1), 96-120.]
- Huang, Y. L. (2022). Social cognition change of middle-income group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endency and impact.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6(4), 102-111.
- [黄永亮. (2022). 转型时期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知变迁: 趋势和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6(4), 102-111.]
- Kelley, J., & Evans, M. D. R. (2017). Societal inequality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s from 68 societies and over 200,000 individuals, 1981-2008.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2, 1-23.
-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1-28.
- Li, C. L. (2022). China's middle income group in the new stage of common prosperity: Growth status and policies design.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2(2), 38-48.
- [李春玲. (2022). 迈向共同富裕阶段: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政策设计.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2(2), 38-48.]
- Li, J. C., & Ren, Z. Y. (2023).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criteria and reasonable scale of middle-income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common prosperity. *Statistical and Information Forum*, 38(2), 16-28.
- [李金昌, 任志远. (2023).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与合理规模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38(2),

- 16-28.]
- Li, J. C., Ren, Z. Y., & Chen, Y. Z. (2023). The logic and path of expanding middle-income group: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ese practice. *Statistical Research*, 40(7), 3-16.
- [李金昌, 任志远, 陈宜治. (2023).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定量分析. *统计研究*, 40(7), 3-16.]
- Li, P. L. (2020). Trends and hot issu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D. Y. Hong & S. J. Liu (Eds.), *Sociology and Chinese social research: Record of Zheng Hangseng sociology lectures* (Volume 1).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 [李培林. (2020). 我国社会分层的变动趋势和热点问题. 见洪大用, 刘少杰(编),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郑杭生社会学大讲堂实录*(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Li, P. L., Li, Q., Xie, L. Z., Zhang, Y., & Li, L. (2019).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inancial Minds*, 4(1), 33-63.
- [李培林, 李强, 谢立中, 张翼, 李林. (2019). 改革开放 40 年与中国社会发展. *财经智库*, 4(1), 33-63.]
- Li, W. (2019). The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 Structure and trends of change (2006-2017).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3(6), 100-121.
- [李炜. (2019). 社会公平感: 结构与变动趋势(2006-2017年).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6), 100-121.]
- Liu, N. (2013). International lessons from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pathways for China's advancement. *Practice in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9), 29-31.
- [刘娜. (2013).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借鉴及我国的提升路径. *对外经贸实务*, (9), 29-31.]
- Liu, S. J., Wang, Z. H., Jiang, S. J., & Zhao, J. X. (2022). A study on the potential, timeframe and pathways of realizing the doubling of middle-income groups. *Management World*, (8), 54-66.
- [刘世锦, 王子豪, 姜淑佳, 赵建翔. (2022).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潜力、时间与路径研究. *管理世界*, (8), 54-66.]
- Ng, S. H., & Allen, M. W. (2005).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3(5), 435-454.
- OECD. (2019). *Society at a glance 2019: OECD social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ITIC.
- [托马斯·皮凯蒂. (2014). *21 世纪资本论*. 中信出版社.]
- Reyes, G., & Gasparini, L. (2022). Are fairness perceptions shaped by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4), 893-913.
- Su, H. N. (2003). Strive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income population in China. *Macroeconomics*, (4), 12-14.
- [苏海南. (2003). 努力扩大我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 *宏观经济研究*, (4), 12-14.]
- Sun, B. C. (2024).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A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panding middle-income groups.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39(12), 112-125.
- [孙伯驰. (2024). 走向共同富裕: 中国“扩中”量化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39(12), 112-125.]
- Trump, K.-S. (2020). When and why is economic inequality seen as fair. *Political Ideologies*, 34, 46-51.
- Wei, Q. G., Zhang, Y., & Li, H. L. (2014). "The dual impress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 study on the percep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3), 1-32.
- [魏钦恭, 张彦, 李汉林. (2014). 发展进程中的“双重印象”: 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公平感研究. *社会发展研究*, (3), 1-32.]
- Whyte, M. K. (2010).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 J. V. (1996). What is social comparison and how should we study i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5), 520-537.
- Xu, Q., He, G. Y., & Hu, J. (2020). Marketization and change of perceptions about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hina: 2005-2015. *Society*, 40(3), 88-116.
- [许琪, 贺光烨, 胡洁. (2020).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 2005-2015. *社会*, 40(3), 88-116.]
- Yang, C. (2019). Th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attitude of middle class in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4), 91-104.
- [杨灿. (2019).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与社会态度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 (4), 91-104.]
- Yang, Y., Gu, Y., & Wan, H. (2016).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9), 11-14.
- [杨宜勇, 顾严, 万海远. (2016).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宏观经济管理*, (9), 11-14.]
- Zhang, W. H., Liu, F., & Xiang, J. (2023). Research on the public's subjective status identity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 *Sociological Research*, (4), 27-49.
- [张文宏, 刘飞, 项军. (2023).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公众主观地位认同研究. *社会学研究*, (4), 27-49.]
- Zhang, Y. (2024). *For a fair world: The sense of fairness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张衍. (2024). *天下为公: 社会变迁视角下中国民众的公平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Zhang, Y., & Wang, J. X. (2023). Re-exploring the issue of misalignment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lass: From identity to class.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1), 66-76.
- [张衍, 王俊秀. (2023). 主客观阶层不对应问题再探讨: 从身份到阶层.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1), 66-76.]
- Zheng, C., & Sun, H. (2016). Income, expectations of social status mobility, and public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An empirical test using CGSS (2010, 2013) data. *Western Forum*, 26(5), 100-108.
- [郑畅, 孙浩. (2016). 收入、社会地位流动预期与民众社会公平认知——采用 CGSS (2010、2013) 数据的实证检验. *西部论坛*, 26(5), 100-108.]
- Zhou, Y., Xu, B. Y., Shi, J. M., & Lin, X. Y. (2023).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physical bullying: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aggression attitudes and the dual moderation effects of low self-control and teacher support.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6(5), 1228-1236.
- [周由, 许博洋, 史敬敏, 蔺秀云. (2023). 专制教养与校园身体欺凌: 攻击态度的中介作用与低自我控制和教师漠视的双重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46(5), 1228-1236.]
- Zhu, B. (2024). The growth mechanism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 in China.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4), 80-92.
- [朱斌. (2024).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机制及其区域差异. *浙江社会科学*, (4), 80-92.]
- Zou, Y. C. (2023). The power of the times: A trend analysis of the class identity bias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in china. *Sociological Research*, 38(3), 180-202.
- [邹宇春. (2023). 时代之力: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阶层认同偏差的趋势分析. *社会学研究*, 38(3), 180-202.]

Psychological meaning of moving toward an olive-shaped society: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and enhancing sense of fairness

ZHANG Yan¹, WANG Junxiu², XU Boyang³, CUI Yuqing²

(¹ Center for Social Psychology Studies,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² School of Mental Health,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³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is a strategic priority toward forming an olive-shaped societ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achiev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hile sociologists and economists have provided numerous social and economic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expansion of this group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income, employment, social security, and industrial economy, research and suggestions from psychologists on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expansion and how it can enhance public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have been lac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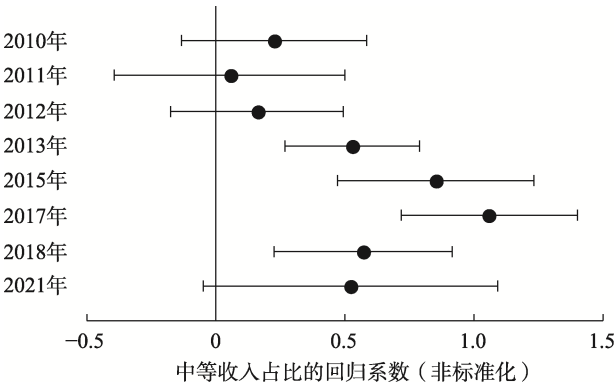
By integrating the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d tunnel effect theory, this study proposes a parallel mechanism involving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and upward mobility perception, and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Data was sourced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covering eight periods from 2010 to 2021 ($N = 61,751$). Participants ranged in age from 18 to 70 years ($M_{age} = 46.20 \pm 13.72$). This study combined the annual survey data from the CGSS and utilized provincial data for period simulation. Given that the research model involved both micro and macro variables, a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employed for analysis, with individual variables treated as level-one variables and provincial variables as level-two variabl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the proportion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was approximately 48%, which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expand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faces difficulties; (2)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ense of fairness, which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SES, and does not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perception of upward mobility; in fa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upward mobility percep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3) at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can enhance the sense of fairness for all groups, while at low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an only improve the sense of fairness for higher-income group, potentially reducing the sense of fairness for lower-income group; (4)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re the expansion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can enhance the sense of fairness for higher-income group through SES, or for the lower-income group through the perception of upward mobility and SES; but will potentially reduce the upward mobility of higher-income group; (5) the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test indicates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robustness and generalizabilit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ommon prosperity should be achieved step-by-step. Whe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low, equal distribution may fail to create a high sense of fairness; however, w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ches a higher level,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fo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gh-quality growth while adjusting the income structure becomes increasingly crucial. Additionall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ifferentiating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sense of fairnes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n varying periods and contexts.

Keywords sense of fairness, social comparison, tunnel effect, middle-income group, common prosperity

附录



附图 1 不同时期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的回归系数

附表 1 并行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的时空异质性

子样本	人均 GDP	收入	中介变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中介变量：向上流动感知			
			B	SE	p	[95% CI]	B	SE	p	[95% CI]
2010~2012 年	-1 SD	-1 SD	-0.088	0.050	0.079	[-0.189, 0.009]	-0.025	0.015	0.107	[-0.055, 0.004]
		+1 SD	0.067	0.054	0.219	[-0.040, 0.180]	-0.014	0.017	0.412	[-0.043, 0.021]
		-1 SD	-0.070	0.045	0.117	[-0.156, 0.008]	0.030	0.016	0.070	[-0.002, 0.062]
		+1 SD	0.067	0.032	0.038	[0.013, 0.126]	0.000	0.010	0.999	[-0.021, 0.015]
2013~2021 年	-1 SD	-1 SD	-0.022	0.027	0.425	[-0.069, 0.038]	0.006	0.004	0.105	[-0.002, 0.015]
		+1 SD	0.109	0.034	0.001	[0.050, 0.175]	-0.002	0.004	0.644	[-0.010, 0.005]
		-1 SD	-0.053	0.037	0.148	[-0.127, 0.015]	0.003	0.004	0.442	[-0.004, 0.012]
		+1 SD	0.172	0.024	<0.001	[0.127, 0.217]	-0.010	0.004	0.014	[-0.018, -0.004]
西部	-1 SD	-1 SD	-0.105	0.040	0.009	[-0.184, -0.031]	-0.007	0.008	0.408	[-0.021, 0.007]
		+1 SD	-0.091	0.041	0.026	[-0.167, -0.014]	-0.011	0.010	0.268	[-0.031, 0.005]
		-1 SD	0.066	0.047	0.157	[-0.021, 0.152]	0.019	0.012	0.119	[-0.004, 0.043]
		+1 SD	0.172	0.053	0.001	[0.066, 0.276]	0.008	0.010	0.410	[-0.008, 0.029]
中部	-1 SD	-1 SD	-0.063	0.054	0.238	[-0.163, 0.047]	0.033	0.012	0.008	[0.014, 0.057]
		+1 SD	0.009	0.058	0.884	[-0.105, 0.108]	-0.001	0.010	0.960	[-0.020, 0.019]
		-1 SD	-0.115	0.044	0.009	[-0.202, -0.038]	0.022	0.010	0.031	[0.007, 0.043]
		+1 SD	-0.035	0.037	0.348	[-0.103, 0.036]	-0.002	0.005	0.700	[-0.013, 0.007]
东部	-1 SD	-1 SD	-0.058	0.041	0.153	[-0.140, 0.017]	0.002	0.007	0.730	[-0.011, 0.018]
		+1 SD	0.278	0.054	<0.001	[0.185, 0.407]	0.010	0.009	0.264	[-0.006, 0.028]
		-1 SD	0.099	0.052	0.059	[-0.015, 0.213]	-0.018	0.010	0.058	[-0.037, 0.001]
		+1 SD	0.154	0.038	<0.001	[0.080, 0.218]	-0.039	0.010	<0.001	[-0.058, -0.019]